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王磊 胡鞍钢^①

内容提要：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平衡性，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增强。但是，在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本原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很难存在，经济的适度发展已成为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而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得到显著改善的国家，大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当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 社会政治稳定 贫富差距

一、引言

社会政治不稳定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SPI) 的影响因素包罗万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迁或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其产生影响。一般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特点：一是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征影响社会稳定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有些因素对社会稳定起到促进作用，而有些因素对社会稳定则产生破坏作用；二是不同因素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权重是不同的，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其权重会增加或减少，即，一个阶段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的因素，在另一阶段其影响可能会降低，甚至不再显著；三是同一因素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在某一阶段对社会稳定产生正面影响的因素，在另一个阶段反倒会破坏社会稳定。社会表现出稳定或不稳定的形态，是不同因素作用合力的结果，如果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大于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社会就呈现稳定形态，基本的社会制度就能延续；反之，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崩溃^②。

那么，当前世界哪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本文通过对当前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希望能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定量讨论。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的主观指标来自世界银行Daniel Kaufmann等人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标”(以下简称“KKZ指标”)，这一指标包括如下六个子指标：表达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个综合指标根据现存的数百个感知指标构造，而这些感知指标又分别来自于 31 个机构的 37 个数据源，包括ICRG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自由之家、世界银行CPIAs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所使用的大部分数据源。在六个子指标中，政治稳定性被定义为“当权政府被非法或暴力手段所破坏或颠覆的感知可能性，包括国内暴力和恐怖主义”。这一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是不同国家官员、企业家、学者或新闻工作者对该国社会政治稳定情况的主观感知评价，根据Kaufmann等人的处理方法，绝大多数国家的得分处于-2.5 到 2.5 之间。该指标 1996 年首次发布，之后 1998 年、2000 年、2002-2006 年共有 8 年的截面数据。作者从数据的完整性、代表性等角度选取了其中 162 个国家对 1996、

^① **作者简介：**王磊，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② 当然，这种单一的判断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在两股力量内部，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并且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形态以及可持续性。比如，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是制度化的、还是非制度化的，是以压制形式出现的、还是以疏导形式出现的，尽管都可能产生社会稳定的结果，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稳定形态。不过，这种区别在定量研究中很难细致地刻画出来，需要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详细分析因素特征与稳定形态之间的机制关系，本文的主要工作不在此。

2002、2006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①。

客观指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2004 年 12 月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口死亡原因调查数据,本文取其中因伤害致死的人口数据作为衡量该国政治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客观标准。作者认为这种衡量方法是可行的,暴力是冲突中常常采用的一种极端手段,有时候,弱势群体所运用的是一种“绝望暴力”。这种暴力甚至会以暴力者自己为对象(自杀或同归于尽)。该数据可以从网址<http://www.who.int/research/en/>上获得,本文利用其中的两项指标:一是各个国家因伤害死亡的人数;二是各个国家因暴力死亡的人数,包括谋杀、自杀和战争死亡。

通过对 2002 年各个国家“政治稳定度”指标和伤害死亡人数(包括故意与非故意)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政治稳定度”与伤害死亡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65,与暴力死亡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21,两者具有统计显著性(sig=0.000)。

三、社会政治情况显著变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体制较成熟、制度建设较完备的国家,即便有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出现,其自身也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因而社会政治稳定程度的变动一般处在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对那些经济发展落后、贫困现象普遍,或者制度建设薄弱的国家,一方面,有更多的因素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国家自身对危机的处理、应对和调适能力较差,因此,相比之下,社会政治稳定的变化较为频繁,并且变化的方向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哪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明显好转?哪些国家则相反,从比较稳定的状态陷入不稳定之中,或者从不太稳定滑向更加不稳定的深渊?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什么改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其社会政治稳定度的变化(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

首先,需要识别出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这里我们仍然依托 KKZ 指标。根据 Kaufmann 等人的研究,1996 年到 2004 年的 8 年间,共有 6 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分别是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香港,其中塞拉利昂的情况改善最大,该国在 1996 年的得分为-2.25,排在 175 位(共 181 个国家),2004 年的得分增至-0.61,排位升至 139 位(共 208 个国家)。香港之所以列入其中,主要是由于 1996 年其面临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当年得分只有 0.3。有 15 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显著变差了,这些国家是科特迪瓦、老挝、津巴布韦、吉尔吉斯斯坦、海地、贝宁、乌兹别克斯坦、中非、尼泊尔、土库曼斯坦、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其中科特迪瓦的情况最糟,1996 年得分为 0.32,到 2004 年降至-2.28,在 208 个国家中排在 204 位,其前后分别是阿富汗、尼泊尔、刚果(金)、布迪隆、索马里、伊拉克,几年间便从社会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变成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1998 年到 2006 年期间,共有 10 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这 5 个国家仍在其中,其他 5 个国家分别是卢旺达、塞尔维亚、几内亚比绍、刚果(布)和南非;有 13 个国家的稳定情况明显恶化,与上述相同的国家有科特迪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其他分别

^① 作者在选取国家时,剔除了一些小国或地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小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受偶然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岛屿国家以及那些曾经或现在仍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对其稳定情况的影响;二是世界治理指标涵盖的所有国家中,大约有 5.7—8.1%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一个数据源,其中绝大多数为小国或地区,比如美属萨摩亚、安圭拉岛、阿鲁巴岛、法属圭亚那、关岛、荷属安地列斯群岛、留尼旺岛、维尔京群岛。Kaufmann 等曾指出,只有 1 个数据源的国家置信区间大约是有 7 个数据源(数据源数量的中位数)的国家的置信区间的 2 倍。

是泰国、尼日利亚、几内亚、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黎巴嫩、伊朗、委内瑞拉。

不过,许多为 KKZ 指标提供评估意见的专家很可能会受到被评估国家长期经济趋势或短期危机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以某一个短时段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分析基础,以此弱化个别年份短期危机带来的显著影响。我们假设随着时间的变化,世界总体的社会政治稳定度有一致的变化趋势,因而选取 1996 年和 1998 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并作为社会政治稳定度变化的起始条件,以其为自变量对 2004、2005、2006 三年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曲线即表示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度都没有发生相对变化的情况。此回归方程为:

$$SPI_{2004-2006} = -0.0119 + 0.859SPI_{1996-1998} + \varepsilon$$

由此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样本国家在 2004-2006 年社会政治稳定度的预测估计值,而实际观测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值,即实际值没有被该回归方程解释的残差 ε 即为该国家的变化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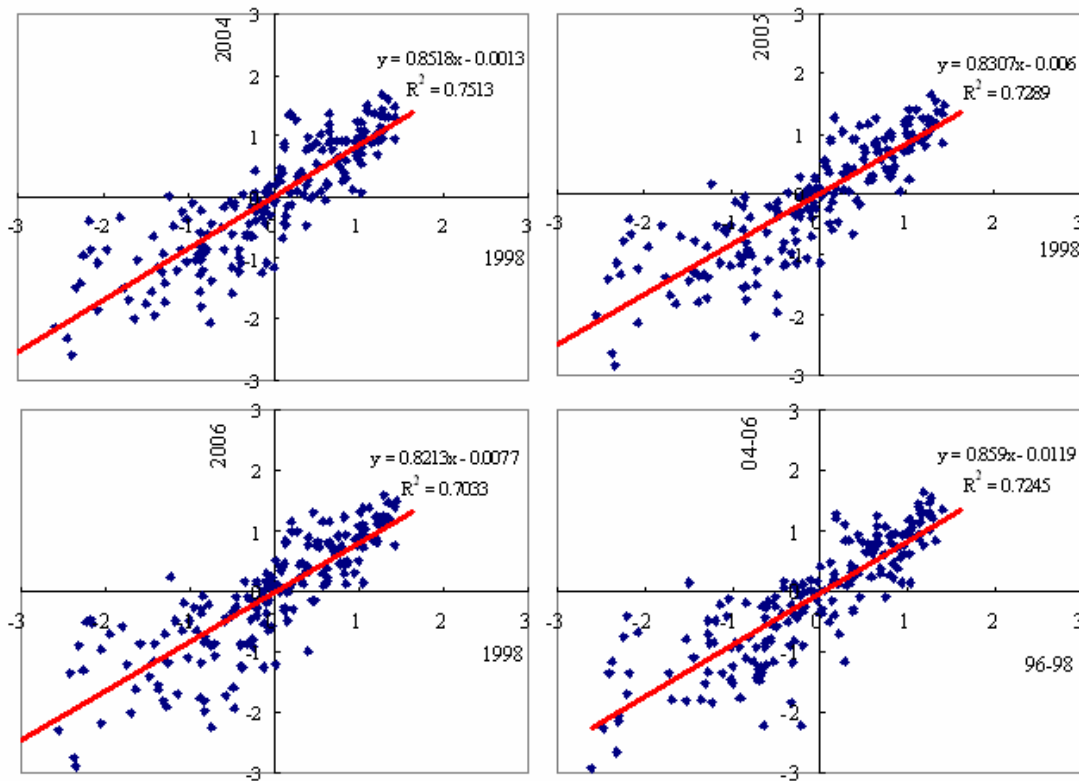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政治稳定情况的时序变化

前已述及,如果这一差值达不到一定的显著水平,实际上并不能认为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情况发生了变化。这里我们认为只有当差值超过 0.7 才被认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此我们得到发生显著好转的国家或地区有 10 个:塞拉利昂、利比亚、安哥拉、卢旺达、澳门、香港、阿尔及利亚、南非、朝鲜、塔吉克斯坦;发生显著恶化的国家或地区 13 个:科特迪瓦、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海地、菲律宾、泰国、孟加拉、津巴布韦、尼日利亚、伊拉克、中非、利比亚。可见,这一列表基本上涵盖了 Kaufmann 等人 2005、2007 年分析的结果。因此,作者将其作为本节下一步分析的样本国家,得到的初步结论为:

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大多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稳定状况恶化的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1996 年至 2005 年),9 个稳定状况明显改善的国家(朝鲜缺少数据,未在分析之列),多数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 4% 以上,安哥拉和卢旺达分别达到 8.4%、7.5%,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相反,稳定状况恶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明显要差

很多, 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较低, 并且在很多年份经历了负增长。津巴布韦在 1999-2005 年连续 7 年负增长, 科特迪瓦、伊拉克在 2000-2004 年连续 4 年经济负增长, 海地在 2001-2004 年连续 4 年负增长。就 1996-2005 年间的各国平均数来看, 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 5.13%, 而稳定状况变差的国家平均增长 2.34%, 前者是后者的 2.2 倍。

动态地看, 稳定状况改善的国家(或地区)都是那些经济增长情况有显著改善的国家, 而稳定情况恶化的国家, 经济增长情况大多经历了变坏的过程。我们以 2000 年为界, 将过去 10 年分为 1996-2000 年、2001-2005 年两个阶段, 可以发现, 在稳定情况改善的国家(或地区)中, 科特迪瓦、澳门、利比亚、塔吉克斯坦在 1996-2000 年的 5 年中经济几乎无增长或负增长, 而在 2001-2005 年的 5 年中, 经济增长速度都在 5% 以上, 其中科特迪瓦、利比亚、塔吉克斯坦甚至达到 10%; 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都有所提高(卢旺达除外)。

而稳定状况显著变差的国家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科特迪瓦、海地、中非、伊拉克在 1996-2000 年间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但在 2001-2005 年, 增长态势未能延续, 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沼, 津巴布韦则从经济缓慢增长变为负增长, 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玻利维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减慢了。当然, 这类国家经济变化的趋势不如稳定状态改善的国家那么一致, 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尼日利亚等国的经济状况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显著恶化。

由此我们看到, 在过去 10 年中, 经济增长是社会政治稳定情况改善的必要条件, 那些经济发展状况改善的国家, 为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 相反, 发生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国家, 更容易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当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 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当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后, 国家的发展更容易步入正常轨道。(2) 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经济发展停滞或者衰退并不是充分条件, 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以及外部势力的侵入, 任何一个因素的单独作用都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社会政治的极度动荡中。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的相关分析

既有文献表明, 社会政治不稳定通常不是发生在静态社会中, 而是发生在动态的变迁过程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稳定性, 他们都具备自我平衡和调适的机制来化解各种社会冲突, 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注意到, 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诺思 (1994) 认为, 经济增长对一个国家意味着内部的不稳定, 经济增长速度愈快, 国家内部不稳定性就愈大。库兹涅茨 (1989) 也认为, 持续性高速增长是一个连续的破坏过程, 因为它对各部门 (即构成总人口的各种集团) 的影响大不相同。在高速增长过程中, 增长较慢的部门的人口较之增长较快的部门的人口集团相对受损, 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少数受惠者获得的利益所能补偿的, 因而可能发生摩擦和对抗。亨廷顿 (1988) 曾经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因素, 经济发展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 其广为人知的研究结论就是: 现代性产生稳定, 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简而言之, 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都经常伴随着以犯罪增加、社会失序等现象为标志的社会稳定状况的恶化。

因此,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全球一体化越来越逼近的现实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

第一,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其社会政治稳定程度越好。世界银行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或人均 GDP 作为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 其发布的《2004 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世界各国分为四个组别: 高收入水平组 (2002 年人均 GNI 在 9076 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水平组 (人均 GNI 在 2935 美元到 9075 美元之间)、下中等收入组 (人均 GNI 在 736 美元到 2934 美元之间) 和低收入水平组 (人均 GNI 在 735 美元及以下)。在表 1 中, 作者利用这样的标准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 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最好, “政治稳定度”指数的平均值为 0.955, 伤害死亡人数的平均值为 46.7 人/10 万人口, 而暴力死亡人数

仅为 13.8 人/10 万人口；其次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而社会政治稳定程度最差的是低收入国家，49 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政治稳定度”指数为-0.782，伤害死亡人数平均为 95.6 人/10 万人口，为高收入国家的 2 倍多，暴力死亡人数平均为 27.2 人/10 万人口，同样为高收入国家的 2 倍。

第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也存在相关性。这里所说的发展阶段，并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意义上，在分类上，作者将各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发达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这些国家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是公认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都较为健全的国家；而“转轨国家”主要是东欧、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那些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样本库中的其他国家，作者将其归入“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的均值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度最好，但比较有趣的是，转轨国家在专家的主观评价中社会政治稳定度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其平均值为-0.093，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0.481，但在客观指标中显示的信息却是相反的，无论是因伤害死亡的人数，还是因暴力死亡的人数，转轨国家都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的平均值分别为 91.7 人/10 万人口、29.0 人/10 万人口，后者的平均值则是 81.1 人/10 万人口、24.1 人/10 万人口。（见表 1）

表 1：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度比较

	政治稳定度	伤害死亡人数	暴力死亡人数
经济发展水平			
高收入国家	.955 (33)	46.7 (31)	13.8 (31)
上中等收入国家	.293 (30)	71.3 (30)	21.3 (30)
下中等收入国家	-.472 (40)	77.4 (39)	25.0 (39)
低收入国家	-.782 (49)	95.6 (49)	27.2 (49)
国家形态			
发达国家	.912 (32)	46.6 (30)	14.4 (30)
发展中国家	-.481 (98)	81.1 (97)	24.1 (97)
转轨国家	-.093 (30)	91.7 (29)	29.0 (29)

注：括号内为参与计算的样本国家数量，由于指标的数据齐备性不同，因此不同分类指标的样本国家总数可能不同。

第三，社会不稳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快慢以及增长是否稳定有关。很多学者利用定量方法讨论现代化速度与社会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Corroe (1965) 的研究中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变迁的速度越快，社会的政治不稳定程度就越高。Ivo 和 Rosalind (1966) 利用 84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变量变化速度快的国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反之，社

会就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下发展，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47。究其原因，Venieris (1985) 等人认为，发展过程中无法实现的收入预期是产生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机理。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但其速度却各不相同，在绝对值增加的同时，有些群体的相对收入却下降了。本部分作者还想强调变迁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稳定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经济波动情况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有学者指出，就某一时期而言，经济波动系数越小，经济增长率均值就越高，社会就越稳定；反之则反。胡鞍钢 (1994) 对 160 多个国家进行交叉分析印证了这一判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快并且波动系数小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情况最好，其次是增长速度快、波动系数较大和增长速度慢、波动系数较小的那些国家或地区，社会稳定情况最差是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负增长、且波动系数较大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用何种指标来衡量社会稳定程度，这四种不同增长类型的国家之间在次序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见表 2)

表 2：社会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类型之间的关系

		增长速度	
		快	慢
经济波动	稳定	.068 (a)	.029 (a)
		73.1 (b)	78.3 (b)
		20.1 (c)	23.1 (c)
	不稳定	-.263 (a)	-.310 (a)
		74.2 (b)	81.1 (b)
		22.8 (c)	27.0 (c)

注：(1) 作者定义过去 5 年的 GDP 增长率大于或等于 3% 的国家为增速快的国家，小于 3% 或者负增长的国家为增速慢的国家；定义过去 5 年的经济波动系数 (绝对值) 大于或等于 50% 的国家为增长稳定的国家，小于 50% 的国家为增长不稳定的国家，其中经济波动系数=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均值。

(2) 表中数字 (a) 为世界银行“政治稳定度”指数；(b) 为伤害致死的人数，单位为人/10 万人口；(c) 为故意伤害致死的人数，单位为人/10 万人口。

五、结论与讨论

经济的增长或发展并不能自动导致社会稳定，这一观点已经被很多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相反，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都出现了利益格局分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失控等现象。但是，如果将这些负面事实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在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的情况，更容易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失序的现象，因为相比之下低收入者、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差得多，在经济滑坡的过程中强势群体、高收入者会把成本更多地转嫁到前者身上，因此他们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如果看一下过去 10 年中那些社会稳定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过去的段时期这些国家大多经历了经济增长。这样看来，经济增长是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条件。至少可以这样说，经历了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目标。

经济增长至少从三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其一，经济增长是一个生产扩大的过程，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加，因此，从理论上讲分配到每个成员身上的平均财富也随之增加了，人们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自我实现需求的资源增加了；其二，在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意味着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增加了，那么政

府处理经济社会事务、应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增强了；其三，经济增长可以给民众以良好的社会预期，一个期待着将来能改善自身状况的人，总是社会政治稳定的积极促进者。

当然，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更不能希望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特别是，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在争取经济增长的目标时，还要想到，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停滞了，应该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将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变量，此处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 胡鞍钢，1994：《中国经济波动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钱乘旦，1999：《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美]道格拉斯·C. 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美]塞缪尔·亨廷顿，198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美]西蒙·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Alesina, A., Devleeschauwer, A., Easterly, W., and Kurlat S., 2003.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 155-94.
- Corroe, Wallace W. A, 1965. "Cross-Nationn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upon Political Stability." *Master's Thesis, San Diego State College*.
- Davies, James C.,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No. 1. pp. 5-19.
- Ivo K. F, Rosalind L. F, 1966. "Aggressive Behaviors within Polities, 1948-1962: A Cross-National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3): 249-71.
-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Governance Matters 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2".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06*.
- Venieris, Yiannis and Douglas Stewart, 1985.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2(2):7-20.